

红色之光

革命先烈叶金坤

岑庆耀

回望 1940—1949 年，白洋湖畔，金仙寺旁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，高涨的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革命者的身影活跃在动荡与激荡的乡村。临近的鸣鹤乡洋浦村（今属观海卫镇施叶村）农家子弟叶金坤深受感召与鼓舞，在进步人士的引导下，毅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民兵队伍，不久加入抗日自卫大队。

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姚东一带抗日自卫大队活动频繁，收缴运往新浦沿修复海底枪色的毛竹，拆毁架设的电话线与交通桥梁，伏击鬼子等，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军的“清乡”计划。国民党局却害怕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，反而严加查禁自卫大队队员。考虑到自身的安危与家庭的牵连，叶金坤虽然在家乡一带活动，但是不能回家。随着抗战的深入和形势的复杂变化，1943 年年底，受党组织安排，姚东一带的抗日自卫大队改组为拥有武装的浒山区常备队，叶金坤成为常备队一员。

叶金坤有个哥哥，为了家庭生计，年纪轻轻前往上海学做铜匠，学得五金制作修补的手艺。1937 年上海沪松会战爆发，逃难回来，几年间在家乡走街串巷，挣钱贴补家用。一次，前往观海卫天妃宫附近的亲戚家做客，巧遇正在天妃宫与部分队员宿营修整的叶金坤，队员们得知叶金坤的哥哥有手艺，纷纷拿出破旧的短枪长枪。看着修理一新的枪支，叶金坤感到自豪。兄弟自此一别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1941 年 4 月余姚沦陷后，余姚县伪政府为了防止民众抗日，先后在各地成立维持会，会长一般由乡长兼任。时任新浦乡乡长兼维持会会长的是孙文荣。当时社会错综复杂，余姚县汉奸政府、国民党流亡政府、社会上帮会团伙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等，一个乡长都要周旋。

1944 年 12 月的一天，已是深秋，天气寒冷。叶金坤随同战友，一行五人，肩背马枪，从王家路下来穿过利济塘河进入新浦地界。他们此行执行一项任务，向新浦乡政府募集活动经费为部队提供给养。与乡长孙文荣洽谈后返回，已是傍晚时分。秋天的夜晚来得早，此时村民已经闭户安息。叶金坤一行人行走在利济塘路上，不料遭遇中警队十来人的一个小分队，旋即，中警队架起机关枪，双方交火，密集的枪击声传入附近村民的耳中。因人员、武器不如敌方，叶金坤与战友当即撤退，暮色中，叶金坤殿后掩护。不幸的是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叶金坤的腰部，叶金坤因伤势过重，体力不支，掉入利济塘河，沉入水中，鲜血在河水中淌开。中警

队又向跑远的常备队员乱放几枪，然后狞笑着捡起叶金坤的长枪离开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早起的村民交头接耳，相互打探昨晚的枪声是怎么回事，有目击者心有餘悸地讲述交火经过。十二三岁的王新华支着耳朵听着大家的七嘴八舌，一直到中午，已经知晓大概经过。此时，利济塘河边赶拢来的人也多了，多数是熟悉的村民，也有四五张陌生的面孔。忽然，河面摇船路过的一位船工惊恐地呼喊道：“河里有人！”大家的眼光都转向河中，众人确定是昨晚被子弹击中掉入河里的那个人的遗体。这时，保长陈纪尧也已闻讯赶到，亲自下河与众人合力把遗体撩起，放在河岸边。保长想从湿透的衣服里掏出一些信息，除了几个零钱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人群中不时传来“嘎年轻年纪，罪过”的言语声。保长与几个热心人商量一番，筹集一些钱，差人买来一具薄板棺木。村民史久发不忍心遗体穿着湿透的衣服入殓，转身从家中拿来自己儿子的干净内外衣裤与一条棉被，收拾妥当，烧过纸钱，准备运到茅洋殿后的义冢地安放。此时，边上的几个陌生人搭话说是他的弟兄，棺木先放着，等会他们来运走。这几位陌生人，原来是叶金坤的战友，他们不想让自己的战友葬身异乡，一早已摇船赶来，伺机接走。一个擅长文艺的战友，写了一曲怀念叶金坤的小调，歌声回荡落在上林湖的山水间。

解放以后，民政部门调查统计为国家为人民而牺牲的烈士，依据叶金坤战友提供的线索，工作人员到叶金坤牺牲地新浦乡高桥村走访调查。当年的少年王新华已是积极向上的青年，他与其他目击者和知情者激动地讲述事件的经过，纷纷赞赏叶金坤的英勇之举。

叶金坤牺牲时，尚未娶妻成家。据叶金坤的侄子回忆：1962 年，民政部门向烈属叶金坤母亲颁发“光荣证书”，“光荣证书”贴在墙上，是一家人的骄傲。当时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集体劳动，每个社员挣工分，一个正劳力得 10 分，大队照顾叶金坤母亲加得 5 分。另外，猪肉票加发 0.5 斤，去街上供销社购物时不用排队即可优先购买。1980 年，有一次洋浦村搭台演戏，叶金坤的掌起战友借看戏机会，寻访叶金坤家属，深情回忆了与叶金坤一起的战斗生活。现今，叶金坤的墓碑矗立在白洋湖畔的慈溪烈士陵园，与青山绿水相伴；叶金坤的名字载入《慈溪英烈志》，流传后世。为抗击外来侵略、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叶金坤烈士，值得后人尊敬与怀念。

王孙荣老师赠我新作《余姚进士录》，大饱眼福。我对史学是门外汉，不会作深层次理论分析，只就感受较深的写几点，表达我对本书和作者的钦佩之情。

先说本书的资料详实，旁征博引。写这种史学类专著，必须积累广博精专的资料，好比建房先要夯实基础。该书正文之后，附有“主要参考文献”27 种。是“主要文献”，而不是一般书目。仅举几部书：屈万里主编《明代登科录》有 22 册，顾廷龙主编《清代朱卷集成》有 420 册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全书收录著作 3461 种，79307 卷。进士案卷只需参考《登科录》即可，作者还要参考《会试录》《乡试录》，这还不包括每位进士小传后，“案”中录入的各种志书。这些文献卷帙浩繁，汗牛充栋。孙荣老师搜集资料真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令人肃然起敬！回忆十多年前，我到王府拜访，孙荣老师领我参观另一间藏书的房子，整间屋都是书！其中一柜都是明代文史著作。慈溪市图书馆参阅阅览室的明代文史藏书，都不及王老师家齐备。孙荣老师为人低调，潜心学术，博览群书，功底深厚。余姚市史志办约请他写《余姚进士录》，他有金刚钻，敢揽瓷器活，可谓得人！

其次是写作严谨务实，考订缜密，一丝不苟，精雕细刻。全书七百余位进士多有“案”，即“按”或“按语”。这是编著者对历代方志选举录及所引用史料文献的考核订正，辨

慈溪家谱

是谱版心、目录作“沈氏宗谱”，签条已佚，此从卷端所题。编者署名：“二十五世宗长成长，总理英瑞，校正英明”。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 年）文肃堂木活字本，四卷，四册。共印 14 部。以“吴兴望族千秋盛文肃名家万世昌”编号。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藏。

卷一创谱序、凡例、祠规、家范、遗训、造敕、祖像、源流序、阖族支派、阖族行第、文肃堂记、诸董捐助名次、藏谱、谱跋、四说、五箴、世系前图等，卷二世系后图，卷三卷四为行传。

卷首同邑附贡生鲁恭猷《创辑谱序》略云：“姚北马路沈氏，自二十二世高字行由会稽栳树下迁居于此，迄今人才炽昌，堪称巨族。惜乎二十二世以上至一世文肃公，因世远年湮，朝代更迭，兼且贼匪扰害，遗稿无存……然沈氏不特马路一支而已也，复有联宗祠，本越郡望公祖而来者，有由上虞夏盖山而来者，有自

别其真伪异同。我粗略统计（不含附编），“案”中对引用书目中资料的舛误，列出姓、名、字、号 58 例，生卒年月 19 例，籍贯 22 例，户籍 2 例，登科年号 3 例，未载、失载、延误、补录等 46 例，其他 47 例，计 297 例。我列出上述数据，足以证明作者撰著考订的缜密，如火眼金睛，明察秋毫。以后还有一个易为读者忽略的细节——进士的生卒年份。如 14 页第一位进士胡穆（1019—1101 年），这个阿拉伯数字是从“真宗天禧三年己未二月十九日生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正月二十七日卒”推算出来的。我国古代以干支纪年，公历纪年是 1911 年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以后的事。公农历的换算，涉及朔望、闰月、跨年等知识，没有工具书，不知要换算多少时日。有一次我到孙荣老师的办公室，见他案头正摊开一本土黄色封面的旧书，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一本非常著名的工具书。看着这本陈旧不堪的书，我猜想他家里案头定然也有同样的一本，因为他写二本进士录，此书须臾不曾离手。而在本书参考文献中，王老师却未将其列入，可见参考文献之义例。再来说说话籍。本书首见 56 页洪武四年登科的岑鹏为“儒籍”，以后有民籍、军籍、匠籍、官籍、灶籍等。用当今户籍类比，好似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。现在似乎无关紧要，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，农民子女初中毕业不能报考技校，招工顶职也受户籍限制。要“农

光绪《姚北沈氏宗谱》

童银舫

会稽西洋江而来者，有从绍兴后桑盆并小高埠而来者，支派不一，概勿详悉，而询及本源，金曰我皆文肃公之后裔。今沈翁英瑞、英明等倡议作谱，挨户采访，稿成付诸剞劂，开鐫于是岁之九月，阅四月工告竣，属序序。”

此马路家，非宗汉街道，而在庵东镇。其实此谱所谓“姚北沈氏”，实指庵东沈氏，且大部分为绍兴栳树下迁来。卷首有《阖族支派便览》，从绍兴栳树下迁来的有七支：殿舍头、三灶下埠头、庵东市、马路家、六家灶、拖落、新湾。另有六支，分别为：小陈家路，由西阳江迁来；庙三灶，由南汇嘴迁来；张家路，由小高埠迁来；傅家路，由皇公浦迁来；祠堂根，由夏盖山迁来；胡家路，由小高埠迁来。

由此可见，此支姚北文肃堂沈氏，虽多为文肃公后裔，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宗，而是“联宗合祠”。故于光绪丁未年（1907 年），在崔陈

转非（农业户口转居民户口）”，按政策要出钱去“买”居民户口……不必细述。全国有许多盐场，庵东盐场即为其中之一。当时“灶民（灶籍）”即盐民（世袭）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明洪武开始，灶民（灶籍）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。周乃复先生在《慈溪进士录》序文中作了评价，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灶民跨越阶层的鸿沟，有向上流动的机会”，可谓知者的论！还需要讲到的是居里地。本书凡例指出，“凡能考证出其居里者，皆著录现境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。”作者特设这一条，无形之中给自己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和工作量，不加工，读者也不会苛求。但能著录今属现境镇、村的地址，将当今的地理信息告诉读者，真是功德无量。因历史沿革，境域调整，本书中的余姚进士，涉及余姚、慈溪、上虞三县。如 367 页马斌，余姚云柯乡（今属慈溪市宗汉街道马家路村）人。作者另加“案”：马斌侄孙马宗汉（1884—1907 年）系辛亥革命先烈。399 页蒋玉泉，余姚梅川乡（今属慈溪市浒山街道水南社区）人，是晚清画家蒋轸的儿子。读起来马上拉近时空距离，有一种亲和力，真有“他乡遇故知”之感。难怪北大教授叶晖在本书序文中说这个工作“令人敬畏”，浙东地域文化专家童银舫先生在《一部地方登科录的扛鼎之作》的评介文章中也给予很高评价，这些决非溢美之辞。附编有“析异、考异、存疑、辨误”四项。“辨误”中，作者没有把唐代

路新六塘南共建宗祠五间，有楹联二副，其一曰：“世家号文肃自戴山高埠以来炳炳烺烺尔宗祖都是越东发迹；望族本吴兴溯榑树桑盆之后绳绳继继其子孙类皆姚北营生。”

《凡例》第一条记述其始祖云：“作谱之法，首著原始，以明受姓之由。是谱以周聘季公为受姓祖，以扶驾昇公为南迁祖，以越国公肃福一公为分派一世祖，所以原其始也。”《源流序》中又记：“……至宋则有谏议大夫讳立，吏部尚书肃雍中，都察院左都御史讳介庵。介庵生三子：重、厚、昇。昇迁右都御史，扶高宗南迁，生璫。穀。璫生伯清。穀生伯温，字克和，行福一，仕至太师，封越国公，卒谥文肃。沈氏南迁后，作一世。”据此可知，迁越始祖为南宋沈伯温（文肃），而迁姚北者，则二十二世高字行也。时在清乾隆年间。

《凡例》第二条记作谱之法云：“世系，谱之大纲也。是谱起周聘季公，至文肃福一公，谓世系前图，载

的虞九皋列入本书唐代进士第一位。“案”中仅用 53 个字（此从略），经过甄别，去伪存真，把北宋胡穆排在第一位，这是经过缜密考订得出的结论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其胆魄见识。历史学家须具备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，我认为孙荣老师皆一一做到了！

第三是行文简练，平实明快。本书中每一位进士的简介是一篇小传。文中有时要引用参考书目中的原文，如用现代文写作，势必文白杂糅，不伦不类。每位进士的字数又不能过多，只能用简练的文字记述。作者竭尽全力，惜字如金。这种洗练流畅、平实明快的文字，读起来赏心悦目，确是上乘之作。如果不是多年浸润在古文字中，是难以写出这种文质兼美的文章的。童银舫先生在评介文章中说，“在我所目及的科举人物的研究著作中，堪称翘楚”，绝非虚言。至于有些读者阅读时对古代官职、科举专有名词，行文中的文言词语读不懂，这也难怪。如要加注 注不胜注。因为这是一部史学专著，是工具书，是为别人撰文、研究提供参考资料，曲高和寡，实难两全。

现在《余姚进士录》和《慈溪进士录》联袂先后出版，作者贯通学术之变，修成专精之学，皇皇巨著，堪称双璧。又因地缘相邻相融，学风学术相得益彰，特向作者致贺！孙荣老师正当盛年，祝愿他孜孜不倦，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，向更高的目标攀登，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，让我们共享！

其大略也。自文肃福一公起，以后垂万世有行第字可排者，谓世系后图。图以提一而终五，取五服之义；横列者兄弟相联，世经人纬，绵绵不已。制虽宗于一本，义实仿自欧阳，至于图左小注，则又例龙门之例，以醒观览。”

行第字号：“福寿康泰，佑启后入，绵延永远，和乐尊崇，吴兴故郡，胶鬲遗民，绍文肃绪，居北海滨，云初贵显，措笏垂绅。”

是谱还有祠规十一条，家范六条，遗训十三条，以及四说（勤说、俭说、谦说、忍说）和五箴（君臣箴、父子箴、夫妇箴、昆弟箴、朋友箴），对于维护宗族团结、社会交往、家庭和睦皆有可取之处。如其中家范第五条云：“国先养士，家首读书，此即古庠序之意也。族有举监生员，尤宜谨守守法，以之为倡。族人亦当优礼之，庶兴贤有德之遗意欤。”这些，都是家谱中着力宣扬的东西，也是宗族文化中值得研究的内容。

史事钩沉

年高德劭——民国大总统题匾探究

沈东海

入秋，闲着无事，携妻去鸣鹤古镇转转。

在古镇中街的“德园”，观海卫书画创作基地那，见偏门开着，便打算进去看看。不成想，这是一个私人庭院，屋主（房租的）虽不苟言笑，倒也不拒绝参观，只是略提醒道：“莫问，勿摸。”屋里院内略参观了一遍，当他得知我妻子会书法，对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请我们上座，坐的还是民国欧化的古董椅，据他说我们是第二个坐这些椅子的人；上茶，上的是上好的白茶。后来得知他想在这开一家茶社，想请我提点意见，于是高谈阔论一番，谈老宅布局、画的搭配、色调、物件摆放、庭院改造等等。他一一认同，点着头。聊到厅上挂的那块“年高德劭”匾，细看才发现右边有一行小字“民国大总统题褒”，左边一个小字“叶”，匾的正上方加盖一个大红印“荣典之玺”，一时把我惊呆了。忙问是谁写的？“孙中山”他答。

听到这，我陷入了一阵沉思，只是略提醒道：“这匾要好好保护，若是能挖掘下，宣传宣传，说不定游客络绎不绝。”他表示认同。而“叶”字他不知何意，我猜测应是受匾人的姓，下面的名应该损毁了，因我略知鸣鹤以前叶氏族人开药店是蛮有名的。

出了这庭院，我一半的精力已不在了游玩上，反复问着自己：“这真是孙中山先生写的？”问的次数多了，答案显然不是的，一是孙中山只做过临时大总统，严格意义上讲，他

没做过大总统，以孙中山的品性，是不大可能会在牌匾上冠以民国大总统的头衔。其二是那个章，一个一心想推翻帝制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使用一个带“玺”（皇帝的印章）字的印章？其三“年高德劭”四字的书风，与孙中山的也不太像。

之后我百度搜索，看是否有关于此的报道，因据屋主介绍的情况，他显然是听别人说的，不成想，还真搜到了。据中国宁波网转载《宁波日报》的一篇报道，可知此匾系孙中山所写的说法，就出于此。在采访的过程中，镇上小有名气的镇史研究专家、67 岁的王盈根老人特意赶来告诉记者：“这匾应是孙中山赐给叶鸿年的。”他拿出《续刻佐白两湖四浦水利全书》，来予以佐证，上面记有叶鸿年的事迹，然后又拿出叶氏后人俞菁写给他的的一封信。信中写道：“我听外祖父叶树棠（叶鸿年幼子）曾说，小时候在宁波祖屋中，曾有一块匾，应是《古镇鸣鹤》一书中提到的孙中山赐予‘年高德劭’之匾额……”

随后，记者查看了由当地乡贤于 2001 年编辑出版的《古镇鸣鹤》一书，其中“古镇人杰”一章中有关于叶鸿年的记载：叶鸿年生于 1847 年，卒年不详。民国成立时，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曾委任他代理鸣鹤场盐事长，后来担任过乡自治委员、商会董事、水利局总理等职。民国四年（1915 年）8 月，吴锦堂（近代爱国侨商）等呈请县知事嘉奖叶鸿年。晚年，叶鸿年荣获孙中山赠予的“年高

德劭”匾额。文中夸赞他“仗义疏财、热心社会公益”。

看到此，假如民国四年的时间不差（1915 年是呈请知县嘉奖，可见得匾时间应该更晚），我可以断言，这绝非是孙中山所写，因那时他早就不是总统了，而是袁世凯任临时总统。而叶树棠的回忆，只能佐证这匾确是他家的，而匾到底是谁赐的，他是以《古镇鸣鹤》一书作参考，不能做依据。

写到这，可能还有人不信，我们可查阅下民国时期几位主要领导人印章的史料，如 1912 年，中华民国国成立，诸事草创，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当时刻了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”与“大元帅印”，却没用几次。

到了三月份，袁世凯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刻了第一枚“中华民国之玺”，用的时间也不长。

民国三年（1914 年）5 月，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根据《中华民国约法》国玺条例，在政事堂下设立印铸局，重新安排刻制国玺，共计五方：“中华民国之玺”、“荣典之玺”（钐盖在颁发勋章等赏赐文书之上），“封策之玺”、“大总统印”、“陆海军大元帅之印”（从刻印中可知，袁世凯一开始就有称帝的野心）。

1915 年 12 月，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袁世凯，准备于 1916 年元旦称帝。这时袁世凯又刻制了一套帝国内容的宝玺：“中华帝国之玺”“皇帝之宝”“颍膺天命，万祚无疆”等。1917 年，段祺瑞解散国会，在

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，组织护法军政府。9 月 1 日，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，这时刻制了一方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”。

1928 年 8 月，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中，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。11 月 2 日，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：“制玉质国玺，文曰‘中华民国之玺’。由于缺乏荆山之玉，只好让各处留意。”此印经过寻玉到雕琢，直到 1929 年 10 月 9 日国庆前一日才完竣。而后新疆省府主席又寻得璞玉一方，送往南京，做了“荣典之玺”，于民国二年（1931 年）7 月 1 日启用。再往后，这两枚印玺跟着蒋介石一同去了台湾（这块匾浙江新闻《都市快报》也曾报道过，但将“荣典之玺”的“荣”字写成了“龙”，文中还提到此印在台湾，一定是与蒋介石手上的那块混为一谈了。袁世凯五个印玺中的三个，如“中华民国之玺”“大总统印”“陆海军大元帅之印”，现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馆内，其他的是否在那，就不得而知了）。

由上可知，除袁世凯和蒋介石外，孙中山手上压根没“荣典之玺”。既然他手上没这印章，又何来盖章题字？而蒋介石的虽有，但时间对不上，而且字体的线条和鸣鹤的不一样，如“荣典之玺”中的“典”字下半部分和“之”字的上半部分，鸣鹤匾额上的章线条转折处带有明显的过渡圆弧，而蒋介石的印章几乎呈垂直。而鸣鹤章上字的线条，却跟袁世凯的“荣典之玺”完全吻合，难道这

是袁世凯所写？

其实不然，当时袁世凯忙着做皇帝，又被众人推翻帝制，加上病入膏肓，哪还有时间和心情写这些牌匾？而这极有可能是 1916 年 6 月，袁世凯离世后，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所写。黎元洪当时虽身为大总统，却手无实权，倒是乐意做这样表彰的事。如同属于慈溪的草起，有一块形式与字迹几乎一模一样的“年高德劭”匾，当时褒奖柴仰清老人，就是黎元洪所写，落款是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（慈溪文物专家考证过）。如：网上题为《保康首次发现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题匾》中记载：“志洁行芳”牌匾，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写给吴元泽（曾担任民国大总统侍卫长和征兵局长，上将军衔）大儿媳吴陈氏的贞节牌匾，除这一块以外，还有黎元洪所题“年高德劭”等三块主匾。而黎元洪手上的印，是袁世凯遗留下来的。因而黎元洪这样带“荣典之玺”印的题褒书法写过不少，而且字迹很像，形式几乎相同，特别是那个印章，都是盖在书法作品正上方。这印，他是代表官方时用的，而他自己的书法作品，都不盖这印，盖的位置也都在落款那。

资料查到此，已豁然开朗，心头的疑云早已烟消云散。归途，又路过那，屋主热情相迎，我不知是因我的点子，还是妻子替他在团契上写的一个斗大的“茶”字，且不去管它。只是我暂时不想将自己的研究告诉他，总觉得未免有点操之过急，只等变成铅字。

返程的路上，我总在想：人活一世，十分短暂，生前不论你赚了多大的钱，手握多大的权，都不能留下什么，只有造福一方百姓，留下点对社会对国家有价值的东西，人生才熠熠生辉，不虚此行，如手捏的一个器皿，捐建的一座古桥，题写的一幅墨宝……在悠悠岁月中，终会等来一个欣赏它的人，因而变得弥足珍贵。这或许就是人来到这世上最终的目的，也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吧。



鸣鹤古镇的“年高德劭”匾